

當我開始回憶我過去的奮鬥，工作，努力及其他很多很複雜的往事時，我總不能不懷我那明麗清秀的安定村，她不是我的生長地，是我童年嬉戲的快樂的故鄉，在那裏，因為得到幾種經驗，我下了一個為將來奮鬥的決心；我揭開我真正的生命的第一頁。

安定村是廣東中山縣裏的一條小村，距離翠亨不過數公里，但人口却不十分少，很多是出外求學去的。我的先祖們都是讀書人，他們都去應考；無疑的這是一個禮教很嚴的舊家庭，而且這個家庭裏面有二十幾人。但當衆人終日準備求名的時候；我的父親却走他自己的路；雖然他的文才並不弱於他們，而他獨專心研究藥石，後來在鄉中懸壺並不用來自給，因他行醫一生並未多取過病人一文；他是一個濟世的目的來施行他的職務的。很多他步行到很遠的鄉村去醫治他

所不認識的人，日落回來的時候，只見他面上露出一個慈祥的笑容，囊中仍是空空的。爲着這個，我母親跟他發生過數次很輕微的爭執。家計的維持，因此成爲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而且因爲我們兄弟多，我們一家人終年却得過着一種貧窮的生活。我還記得，我生出來直到我十三歲離鄉的時候，我還未穿過鞋子，一雙整天在鄉間奔走的腳，有時只能穿着木屐。雖然如此，但我們那時是很快樂的。

七歲那年，我父親送我到子館裏去唸書，唸那些我那時的能力所不能了解的舊書；我繼續的唸了四年，但我學到什麼呢？那實在太幼少了，所以我到十一歲的時候，我父親將我轉到一間鄉中的富紳們所主辦，在當時認爲最新式的學校——中西學塾。

這間有二百多從各鄉村來就學的學生，名字雖然新，但事實上仍舊是舊的，所教的東西離不了四書五經和一些粗淺的英文，入學的第一年，我還能規規矩矩的讀書，但後了因爲我的頑皮及其他兒時的

的刺激，使我再無心在鄉中繼續唸下去，我成爲一個終日在小溪阡陌間流浪而無往不歸的孩子。我所謂兒時的刺激，是兩件我不能忘記的事情，兩件幸與不幸的意外事；牠們曾使我憤怒與受罪，但也是後來致成我離鄉出外求生的間接原因。

在我們的大家庭中，我的伯母是比較上最嚴厲的，對於家裏的幼輩及僕人常施用她那種威嚇的手段。有一天她以房中吊簾上掛着的兩個銅錢不知怎的失却了。這尋不獲，她使大發雷霆，後來竟說這是我母親的婢女偷去的，婢女的不承認更使她發怒，竟把婢女的手掌平擱在木棧上用鐵鏈來鎖；在婢女痛苦的號哭中，兩隻手掌都重傷了，她才罷手，我在旁邊看了，心中極感不平；一方面我可憐這不幸的婢女，同時我憤恨這殘酷的伯母；自己總懷着一個爲弱者報復的心。

報復的一天終於來的，我伯母是纏足的，纏得很小，有一次我在她面前走過，有意的用腳在她那兩隻金蓮上認踏了一下。這可不得了，她小題大做，認這是一種無家教的絕大過失。全家都給她的激怒和惡罵，鬧得紛紛起來，結果先責罵我雙親的不會教導孩子，其次是強迫他們輪流將我痛打，伯母的威權在家庭裏是無人敢反對的，父母們只得忍痛將自己的兒子在他入盛怒之下鞭撻；我永遠不能忘記的。這流淚的「家法」使他們做了傷心大事，而我自己，從此後無心再留戀這個大家庭，我的思想總盤桓於離此遠去的念頭中。

離此不久，在學校中受了第二件不快樂的事，這是我對所處的環境感覺不滿，更企望走往一個新的路途。事情的起因，仍舊是很微小的；在學校裏教我們的教師，是一個滿清的人，叫做陳鳳洲，也對於學生們不特全無感情，且常施行那些舊教館所通行的「毒刑」；學生們對他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天他出了一個對聯叫我們來對：「放牛歸舍下」。這個對是笑弄我們放學時的情形的，我們在快要放學的時候看見這一句東西很是不高興，沒有一個人交卷。他帶着一種諷笑的口氣命令我們馬上上去對答地，我們之中有一個年紀最大，大約有廿多歲的學生，他是鄰鄉中一個富紳的兒子，他倉卒的寫了一句不工整的對，目的在洩氣同時諷笑那個終日偷懶的惡教師，他在紙上寫：「野豬常帶眼。」寫了之後用力強迫我拿上給先生看，先生看見了不由分說用戒方在我頭上痛打，把我打暈了，過了十幾分鐘我才醒過來，這個惡毒的教師看見我醒過來，還覺得得意得未夠，再繼續的在我身上亂打，致體無完膚；其他的同學看

見了很驚駭和憤恨。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我便天天逃學，決心不再到那間學校上課了，此外還有三十幾個代我抱不平的同學，便約好一塊兒逃學，每天我們一齊到各鄉山溪深洞中去遊玩，享受我們那時無所編造的兒童的自由。但報復心的念頭是不能完全消滅的，我們常拿着銅鑼在學校的四周巡邏，專和那個教師搗亂，鄉中校董紳士們見了都很生氣，要着人拘捕我們，我們這三十幾個野馬的孩子，便帶了些食物逃到鄉中的雲梯山去匿避，過了一個星期才敢出來。

雙親見了這種情形，知道我在鄉中是不能唸書的，若是長此以往必沒有好結果，遂決心打發我出外謀生，自己亦早已覺得非離開此地不可。我十三歲那年，雙親便托人把他們的長子送到爪哇一個親戚家裏去了，我穿上我第一雙鞋開始出外尋我的命運。

當時去爪哇的船一定要經過星洲的。那時同胞到那邊去的很多，每次船總有一千幾百，他們多是披被去當苦工的「豬仔客」。船到星洲時所有的中國搭客都被強迫把衣服脫光，讓一個猙獰而目的外國人檢驗，這一種恥辱直到現在仍深刻在我腦海。及船抵爪哇時，始知那些同舟的「豬仔客」，都是轉乘小船入山中做苦工的；這些人一入山後便很少能夠生還。此時我在明白當時同胞之被賤視與不幸，但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不是仍舊有這種極羞恥極可憐的事情嗎？現在被人用賤價招往臺灣的福建「豬仔客」，不是仍舊百無一生還嗎？

我自己那時能幹能幹不隨同「豬仔客」的命運，而得到親戚的介紹，入他的小機器店裏做學徒。那時機器沒有現在的進步，尤其是他那間小店是很簡陋的。車牀馬力電機都沒有，什麼事差不多靠人力。做徒弟的照例是辛苦的；我每朝早由七時起直做到晚上十二時止，每日做十七小時，星期日沒有休息，起初每星期發給我五分錢工錢，後來加多一倍，改爲一角錢。晚上做完工的時候，精神和身體都非常疲倦，什麼地方一躺下便馬上入睡，有時日中給師傅打罵過，身體有些地方在發痛。

這樣幹了一年多，他們都說我很有進步，手藝很不錯，同時這間小店也發達起來，我初入時只二十幾個人現在增至六十餘人；我私心極想讀些書；便大膽的請求親戚允許我到那時爪哇剛設辦的中華學校裏每晚讀兩小時夜校。親戚看見我在過去一年中工作得不錯，又很勤力；特許我每晚七時後不用在工廠工作，去那學校讀書。這時是我自己要求讀書，故很是用功。讀了一年多後，成績很不錯，學校教員都很喜歡我，常勸我不要做工，專心唸書。但做學徒照例要三年才滿期，我還未滿期，我便把自己的心願對親戚說，說自己不想再學機器，想專心唸書，竟蒙他允許，我便快樂的放下了我的鐵鏈，專心在教員指導和書本中，尋求學問了。

爪哇爲荷蘭屬地，想學好的英文到星洲比較好些；遂馬上轉到星洲一間教會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 裏讀書。在學校裏讀書頗便宜，連食宿費每月十五元，本來還有一種二十元一月的，因我的用費都是親戚供給的，每年只二百元，除了必須費用外，零用費差不多沒有，故一切使用都極極儉約。所食的只白飯，辣椒和水，但當學徒時對這些簡單的食品已有訓練，故不覺得怎樣。

這間美國教會開辦的學校，制度是用英國制的，分開七班，我初入學時被列入第三班，全班都是七八歲的孩子，那時我已十五歲，他們都叫我做「爹爹」，那兩個教員是十七八歲的少女，我讀了三個多月她們還未和我說過一句話。大年紀入低班使人這樣歧視，真使我難過，便決心拼命用功，一有空閒即拿着書讀。晚上學校七時關了燈後，到廁所裏繼續讀書，但毛廁裏有味，便偷買熟煙抽吸，我抽煙的歷史是這樣開始的。學校的同學裏面，中外人都有，他們很多都以我爲笑柄，我在他們面前經過時他們便譏笑我，食飯我到遲的時候常把我應得的飯菜偷去吃；在臥室中常對我惡作劇，有時還集合幾個人來欺侮我。我真不明白低班爲什麼是一種罪過。我自己反覺得這是一種鼓勵。

我的苦幹終不是枉然的，入學後我進步得很快；每學期都跳班，這七班制的學校，頭尾只讀了兩年便畢業了，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還加入了當地英國人所組織的義勇隊，我加入的目的，一方面想得到美勇隊發給的皮鞋和制服，此外我很想學些軍事的常識。這是我第一次領受的軍事訓練，雖然受訓的時間很短，但我覺得這是很意思的。

這時聽說孫總理剛抵星洲，想鼓吹華僑從事革命。我極想加入，但因自己在星洲一個人也不認識，不知從何入手。有一天無意中在路上拾得一本民報第一冊，我把牠帶回學校裏看，裏面的關於革命的言論，我看了非常感動，尤其是裏面一篇章炳麟所寫的「哀陸軍學生文」，最深入我腦中。同學裏頭有一位姓張的，看見我常閱此書覺得很奇怪，回家告訴他的叔父。有一天他帶了他的叔父和另外一個朋友到學校來看我，這位朋友就是李曉生先生，是和我最談得來的知己，他們兩個人都是革命黨人，認識之後我們時常來往，那年經

他們介紹加入同盟會後遂和其他的黨人結識，同心致力革命，而我想加入革命的心願因得如償。

在星洲的教會學校畢業後，他們却鼓勵我到英美再繼續讀書。我自己雖然早有這志意，但因沒有錢很是躊躇。後來張說美國是一個平民的國家，那邊很有機會半工半讀的。遂決心再請我的親戚供給我到美國去唸書。剛巧親戚的機器店生意很發達，我回到爪哇請他時，他竟願意給我中國幣一千元作求學之用。我便拿了這一千元買舟回香港，到香港時已用去三百，再寄三百元回故鄉給親戚作家用；此外還帶助一個同學一百多塊，尚餘已很少，自己便買了一張到美國去的大船船票，再離祖國遠涉太平洋去求新命運了。

初時一心以爲到美國後便可直考入學的，到三藩市後始悉英美的教育制度不同，在星洲畢業後本來可直入英國的大學的，但到美國便不能夠了，他們還有一個四年畢業的高等學校，這頗使我麻煩，我只得再入高等學校多讀兩年再考入大學。我初到美國時，一個人也不認識，後來識了一間古玩舖的老舖，經他介紹識了幾個華僑，課餘之後便教他們的子女中文。晚上還在一間夜學裏教英文，這樣，我的生計才能勉強維持。

我在 Ohio 大學讀了一年後因覺東方謀生不易，即轉到加省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繼續讀書，在學校旁邊和幾個朋友合賃了一間房子居住。那時我的生活很夠辛苦，每日平均最多睡五小時；一方面自己要出外謀生計，一方面和朋友暗中辦黨部，此外還要自己念書。而且當時華僑的革命思想還未十分發達，在運動革命的工作上，每感失望，記得有一次在三藩市唐人街和一位姓陳的跟孫總理在街上搖旗吶喊的宣傳革命，我們三個人站在街上叫喊了半個鐘頭，還沒有一個華僑敢走近來聽。這可見一斑了。但我們並不灰心，暗中集合同志組織同盟會外，還辦了一份中國少年週報，專事鼓吹革命；後改爲日報，即今日三藩市之少年報，爲在英最先有之革命報。

我們大家辦報都是服務性質，不特一文沒有拿，有時還要自己貼錢。起初我擔任的是翻譯，後改爲助理主筆。這樣幹了三年，華僑的革命思想進步很多，反清空氣漸漸擴大。這時報紙銷路很好，我每月便得二十元薪金。但自從辦這報後，我每晚最少做三小時工作，深夜一二時才得回家休息，翌晨七時許便要起來預備上課，這種生活雖然辛苦，但我的中文亦得因此改善了不少，經驗也增廣很多，在大學裏面又因連着三年都被選爲中國學生會長，和兩年的萬國學生會會長，結識朋友漸漸多起來，自己亦趁這機會來訓練辦事的能力。

除了在報館做事之外，還和別的地方做些零碎的工作，如爲中國領事館做些報告和英文演說文等，月中收入亦足以維持研究院中研究政治經濟，研究院中的功課比較輕鬆些，故特別想出來活動。我和一個朋友兩人合辦一個星期週刊，叫做誠報，目的想在學界中宣傳革命，初意並不是想賺錢，但出版後竟意外的賺了些錢，此後又和哲生先生等合辦民口雜誌，目的也是在宣傳革命，每一台辦報，都多得益，我的國文也因為時常練習而比從前好得多。我覺得課外活動是很有益的；希望現在讀書的人，都出來做些課外活動。

我在學校雖然研究的是政治經濟，但課餘時常參讀關於建設和實業的書；尤其是在研究院的時候，常抽暇研究和調查美國的一切建設實業，我自己深覺得若革命成功後，能使中國強盛的，從事建設實業在是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我還執着一個實業救國的宗旨，來學那些應該懂得的知識。

一九一五年，我回祖國，計在美共念了七年書，却是半工半讀的。這期間，許多次雖然很感拮据，但總能設法解決；記得有一次，身上不名一錢，欠下房租設法償付，遂努力準備參加學校舉辦的演講比賽，結果得了第一，得了一百二十五元的獎金，足夠數月的開銷。還有一次，也是兩袖清風，適值黃興到美國來，叫我給他



影相國美在入夫其與者作年二廿國民

翻譯一本「墨西哥革命史」，要我在一星期內譯完，因他只逗留幾天便要回別的地方去；我依期交給他，他喜歡得很，還給我一百五十元。物質上的困難，因此又得解決了。由這些經驗，我深信只要肯苦幹，很多困難都能容易解決的。

回國時帝制已被推翻成立民國，照理應着手建設的。我自己亦打算在這上面活動，故回來時即想直回廣州；但那時龍濟光盤據廣州，他對國民黨人拘捕得很嚴酷，只得暫留在香港華人青年會裏做幹事和青年會夜校的校長。同時自己出來集合幾個朋友採辦錫礦；在廣東東江北江都有四個礦場，工人有二三千，那時歐戰正打得利害，需要錫礦甚夥，做生意非常發達；但歐戰一停，這錫礦亦跟着停辦了。這是我回國後破曉兒第一次所辦的實業。

歐戰後一年左右，我辦大星皮革公司。工廠設在廣州河南反硯殼，成績很好，貨物運到上海等處；每年賺利不少。後來因政府對牛皮的苛捐雜稅太多；土匪四出為患，運輸不便；這極有希望的皮革公司，只得被迫暫時停辦，算來只辦了八年，多麼可惜！

當皮革公司辦得順利的時候，我另外還創辦一間銅廠——大生銅廠；一間松香廠——大裕火酒松香廠；和接辦一間灰砂磚廠——裕益灰砂磚公司。除了松香廠因為用非其人，及其他各種困難致未出品便停辦外，其餘三間廠當時却很有成績，年年盈餘。一年辦了幾間成功的工廠，心裏更想再努力創辦其他實業。雄心很大。但那不長



影近氏固天程者作文本

進的政府總是多方摧殘實業似的，其苛捐雜稅之繁重，實使人發生反感與困難。別的不說；就以銅片來說吧；由銅碎做成器皿時，須經過十五六種稅捐，其繁重可見一斑。此外在運輸上土匪的勒索，每月須奉他們不少費用，所謂「抽行水」者，即付給土匪的捐稅，而政府對於這種不合法律的強搶，從不保護；就這兩個原因，無論何種實業都會被其摧殘殆盡的，由這些經驗，我知道政治一天不上軌道，實業一天不會發展的。

但就我在辦工廠時所得的經驗來看，自覺快樂的，就是工廠內能容用很多工人，救濟那些失業的同胞，使他們不用再被運到外洋做「豬仔客」。此外自己的生計亦可藉此維持；故辦實業的確是利國利人利己的事。而我自己也專心走這條路；不願他顧，故談法那年程壁光幾次叫我到汕頭做海關監督和交涉員，我因不願離開實業，謝絕了他。

但我後來終竟走入仕途，不過我所做的情和我的心願仍舊和諧的。民國九年，粵軍由漳州回粵趕走莫榮新的時候，國民黨人多集廣州，大家都很想把廣州弄好，以便成為革命的根據地。市政府組織成立時，哲生先生做市長，市政府的工務局是辦理建設的，他們請我長這局，我覺得這和自己的志趣很合，便答應了，這是我為政府做事之始。

這個工務局是由市政公所改成的，當時廣州的市政很壞，道路交通等都很惡劣。魏邦平剛把城隍折毀，瓦礫土塵滿地。

街巷狹窄，道路不平，一切却亟須着手修理建設。這個工務局在建設上的責任之急需和重要，遠過其他各局，而且那時財政極為紊亂；以前市政公所拆城時又欠下百幾萬。身當這個職務，起初頗感困難。後來經過了多方活動努力，才把事情漸漸弄過來。

那時廣州的人民很是頑固，對於建設上，多方為難；尤以反對建築馬路為最利害。我還記得在關太平路為馬路時，全市的紳士們都激烈反對，差不多要用武力才能開始工作。其次是沙基馬路；那處的居民竟集合很多人把守道口，不許工人拆開窄巷，直等到廢歷年初二那時，各人都守在當中打牌過其快樂的時候，即率工人趕速動手工作，人民的攔阻，我以為還不算十分困難；最棘手的是沒常識的軍閥的跋扈強悍。廣州那時全市有六條街道的總督衙門，叫做六脈衙，在滿清時每十年只通洗一次；但到民國後還未洗過；不特極不合衛生，街道的水患常由此來的。我長局時即首先清通牠。其中有一條衙門，頭尾都通洗過了；當中那一段剛巧在一個部長的房子底下；他不許清理。要知道，一條衙門尾雖已通而中間不通，仍舊是沒用的。工務局人往工作時，他竟開槍拒絕。軍閥的蠻橫，真不知破壞了多少事情！

當任以來，廣州市的馬路交通，雖未整個完成，但已略具形式；全市的建設，如內港，鐵橋，合署，暗衛，自來水廠，電廠，平民宮等等，却定有計劃，後來自己離開工務局，別人接任已換了好幾位，而這些工作一件都沒有建設；過了八年後我回廣州做市長時才自己一件件完成，想來使人多麼感歎！！

很多人都說辦市政上的建設，若沒有充分錢財，便完全不能做事；這我以為也不盡然。我以為只要你肯去做事，肯努力去幹，錢這問題，便很容易解決的。讓我講一個經驗吧；我長廣州市時，我建設計劃的預算，在一千萬圓以上；政府沒有錢撥發，這一筆款從何處籌來，我自己還不知道。但我素來相信建設便跟着有錢，好像我建珠江鐵橋時，所費百萬；但因建築鐵橋所得新填的地段，其價值三百多萬，除了付給鐵橋建築費，尚盈餘二百多萬；其他如建築內港等，結果也是如此。

因此可知做市政的怕沒錢，最怕是怕不做事；很多仕人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宗旨做事。這用來維持其官位的長久或者可以，用來辦市政，最愚蠢最不合宜了。所以我以為即使不建設，亦應該努力改良。而且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政府所辦的事若完全以人民的利益為前題



影合之子公兩其與者作時年八國民

而絕不與人民爭利的，則人民一定很樂於幫助，我在廣州所開辦的馬路，其建築費大半由人民自己負擔，並由他們自己保管開支的，而政府因此做了一件兩益的事。

不過在中國辦事，常為時局所影響；我在工務局時，本欲傾注全副精神做我的工作的；記得有一天下午六時許，孫總理請我到他那邊去，說有事要跟我商量，我到觀音山他的宿所時，他拿了一張紙寫給我，說：

「你辦市政建設，有一件事要辦的，那是水電廠；我想向×方借款五百萬，這是他們的合同，你拿回去細細研究，簽了字拿回給我。」

不料當晚十二時，陳炯明作反開砲打觀音山，我們的計劃亦給他打碎了。我們相率離開廣州，我的工作於是告一段落。

孫總理被趕走逃到上海後，積極想倒陳；派我到爪哇籌款，不料到爪哇後給其當局監禁了一個星期。本來總理想叫我籌十萬的；後因我被囚禁，繳動華僑的忿怒與同情，竟捐助十幾萬，此誠不幸中之幸事了。

不久陳炯明失敗，我們都回到廣州，但那時廣州的政局，已與從前不同；黨人意見分歧，各有派別，我對任何一派都不願意參加，回到我的工廠裏，努力實業的工作。後來俄共黨侵入，政府聯共的空氣漸成具體化。俄人在粵又漸漸增多，我覺

當局政策，很是危險，極不贊成，任何聯共活動，我都不參加。

那時廣州的農工兩界已給俄共產黨統制左右，但學界的思想非常雜亂，尚未統一。於是有人叫我到法政學院當院長，想叫我學生的思想挽回過來，因那時各種運動差不多都是給學生支配，而學生運動最激烈又在主動的地位是法政學院的學生。我就任後努力糾正他們的思想，和他們都很合得來。學生們的思想逐漸的走上軌道。包羅庭恨我，他對人說：「現在農工兩界都已統制，獨學界不能統一，這個程天固太惡了。」

可惜那時共黨勢力太盛，政府已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用恐嚇的手段對付那些反對他們的人。我和法院裏的教授都聯袂辭職。我遂攜家眷回到我明開的故鄉，住了幾個月。在鄉時做了一本小冊子——聯俄的討論，批評政府聯共的失當。

果然不久，國民黨人及當局者都知道聯共的失策。結果發生「清黨」的運動。古應芬先生請我回廣州共同做「清黨」的工作。工作時從前法政學院的舊學生幫忙不少。廣州共產黨的勢力差不多消滅殆盡，廣州政局亦跟着從新改組。

清黨後，古先生入南京當財政部長；中央那時定了一個關稅自主政策，中央打電叫我入京當關稅處處長，處理這件工作。我覺得革命以來，這是一件最愉快的事，自己極願意為這事努力，便即入京。希望為國家盡自己一份的能力。

關稅自主這件重大的事，引起國內外非常的重視；我入京時，胡展堂先生即對我說：「這關稅自主，是國民黨革命以後第一件最有價值的把戲，務須謹慎從事。」

本來定九月一日宣布關稅自主的，後來因各種關係延至十月一日；不料離宣布自主之前十幾日，南京政府不幸塌台解散，這乘心企望成功重大的工作遂成泡影，世事多麼不測！

外國政府對於我們此舉贊成的很多，反對的只有日本一國，後來擬與他另定互惠條約，他也贊成。而國內人民對此事之興奮熱烈，為歷史上所罕見，各地整千整萬的巡行表示，此極有成功可能的工作，在旦夕之間竟爾失敗，實全國之不幸！直到現在國難日非，關稅不特不能自主，且

不斷的受日本無厭的壓迫侵略，國家自己不爭氣，夫復何言！

我卸職後，即隨黨中元老出洋考察。民國十八年，我們在歐美考察完畢即回國。中央政府從新組織，五院制就在這時成立的。回國後我留在廣州辦理市政，同時管治我的工廠。直至民國廿一年下半年，我才離開廣州。

未離開廣州時，我被任為廣東建設廳長，在建設上我擬了一個計劃，即我所謂「三化」計劃：①公路化②農業化③電氣化。可惜時局變幻無常，在任僅數月，我因為各種關係，自己辭了職，故所擬之計劃，尚未實行，實甚可惜！

「二八」十九路軍行滬抗日時候，我向任廣州市長，職訊傳來我使馬上由市府撥款五萬元電匯至上海為贊助抗日之用，我知道這是由粵方第一筆幫助十九路軍的款項。匯了之後即即召集商會會議，再籌十萬元匯至上海。幾天後我把我的長期經濟幫助抗日軍計劃呈給廣東政府，他們通過後正着手工作時，失敗的消息傳回廣州，這事始擱下！

抗日空氣非常緊張激烈的廣州，這時候發生兩件嚴重（？）的事，本來不值得什麼大驚小怪，不過有些慣於小題大做的國家是別有用途的。

第一件是廣九車站中一個日本人給入打死。日本領事即提出嚴重抗議。口頭上提出幾條條件要完全答應。我當市長，外交問題是由我負責的，對於他所要求的條件覺得太荒謬無理，完全拒絕，我回復他大意說我們廣州的民情對於日本非常忿激，想他們也明白這種原因和情形。現在一個日本人穿了和服，在大庭廣眾的車站出現，激起人民的憤惡已不待言；這個日本人因言語不通還侮辱了一個黃包車夫，這如火上加油，更難把不平之心壓下了，所以旁邊的人事抱不平把他打死。自常情來看這不算怎樣希奇的；況且這死者的名字連日領事還不知道，是否有意模倣生事，尚在疑惑中……經過我這次的交涉，結果只補恤二千元為死者的安葬費了事。

第二件比較嚴重的，是因為一閱報紙叫作共和報登了日皇被刺的消息。這件事本來是極平常的小事，但日領事又藉此多方威嚇，謂為對其天皇不敬，嚴重的提出

蘇聯的動態

ACTIVITIES OF U. S. S. R.



Athletes from the Red Army marching on the field.

蘇聯運動會中進式之動紅大聯。行部軍會運



U.S.S.R., for political reasons,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Eleventh Olympic Games held in Berlin, but had a national meet all by herself. Above photo shows the opening at Moscow, in which the feminine participants gave a mass exercise exhibition.

八月在柏林舉行之世界運動會，蘇聯因與德國政治立場之不同，拒未參加。惟事前蘇聯曾自行舉行一全國運動大會，其壯烈不減柏林，亦為在莫斯科，女運動員之體操表演情形。



A huge statue of Stalin being carried around the Red Square at the opening of the meet.

運動會開幕典禮。重而全體熱烈。狂呼像遊動式形行林員少。

五個條件，限期答覆。神氣非常利害。市民對此更為忿忿，空氣很是緊張。軍事方面及當局者，對此事也非常注意，開了好幾次會議，來討論處置方法。對於他們提出的五條件，我完全拒絕。日領見我這樣強硬，便對我威嚇說：奉了內閣之命，非要我方完全接受其條件不可。若不接受當取斷然手段，即派戰艦來廣州云云。事情似乎愈弄愈嚴重了，日本的強惡無理的手段，使人民恨忿得很。金融亦受其影響，紙幣由八幾跌到五幾。當局得了所謂「斷然手段」這消息復即星夜開緊急會議；我在會議中說：「如果我有一天負責處理這事；我一拒絕其要求。如果萬一他們真的派兩隻戰艦來，那軍事當局便須準備應付了」。會議結果仍由我先繼續和他們交涉，看弄得怎樣才定。深夜回家後我在思索一個妥當的方法來答覆明天十二時他所限的期限。

翌日十時許日領領着幾個全套武裝的武官來市府找我，聲勢洶洶的質問我的答覆，我對於這件所謂不敬天皇的事已想好一個答覆了。

「貴方認共和報所載的消息」我對他們說：「為對貴國天皇不敬，這消息是從別的報剪載的，並不是虛構；且所載的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絕不應引起這樣大的麻煩；退一步講，即使真的有些不敬，亦不能提出這五條無理的條件。現在貴方說我們侮辱貴天皇，便如此處置；假如貴國人民得罪我們敵國人民又怎樣呢。要知道敵國為民主國，人民為最高主權，正如貴國以皇帝為最高主權一樣」。

「我們敵國絕不會做這種事的」。日領肯定的說。

我縱容的在抽屜中拿了一張我事前預備好的美國雜誌給他看。這美國雜誌裏面印有一張相片，是攝東京市民大會的情形的，會場中滿貼着侮辱中國的標語；什麼「打倒支那人」，「支那人都是卑賤的」等等，不一而足。他看了起初還強辯否認那些不是日本人，是外人假扮的；後來經我指明給他看，他才很不好意思的承認，那時我的態度漸漸強硬起來。

「貴國認刊登天皇被刺的消息為一種侮辱，而提出五條件；那末敵國亦可向貴國提出這五條件，不知貴國能否接納？」我爽直的對他說。

他的態度和柔得多了，比起他進來時的相差甚遠。

「但這是敵內閣的命令，這五條件貴方須完全接受，貴國與敵國素來親善，這些條件應該接受。即以我們兩人的友誼來講，亦應接受二三條。若一條都不接收，我的位置便被撤去了。你知道這是內閣的命令，我是不能違背的。」這種語氣已成為請求的了。

「我不接受」我說：「你個人不過被撤差；若我接納這五條件，我的生命馬上便發生危險了，你還不知道我國人民憤激？」

他見我還是那麼強硬：面上露出困難之色。

「聽說貴國的戰艦明天將抵廣州，」我迫着問他：「若真的到來，人民一定更加洶忿；且貴國的戰艦來到，我們的生命財產想一定會遭危險，說不定雙方發生誤會而動武的。所以請通知現居留全廣東的貴國人民，馬上離開廣東；不然若萬一發生不幸事件，鄙人不能負責保護。」

他聽了面作難色。我對他說除非戰艦不來，則問題將不能解決，我之所以請求他們離粵，完全是他們自己迫成的。

後來他答應打電回國跟他們的內閣商量，翌日下午三時他再來市府說戰艦已決定不來了。當夜汕頭有電來說有兩隻日艦抵埠。我即往找日領說戰艦仍未離廣東，着即調查。翌日汕頭電報來說戰艦離開了。結果由共和報寫一封信到市府，擔保以後謹慎刊登新聞，不要登侮辱人家消息。這一次小題大做的事，就這樣簡單的解決了。

長縮懦弱是最敗事的。「九一八」以來日本不斷的侵略，最近更變本加厲，諸方威迫；國家實已不能再忍受的時候。但對付外敵，國家必須統一和有準備，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四分五裂而又沒有準備的國家對面而能得到勝利的。我們做國民的，應該熟悉這點；大家精神團結，努力國防，一致對外，那末國家的命運，才可轉變過來，我願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詞以自勉，同時以勉。